

第五章 結論：市場開放後的挑戰與契機

一、市場開放前的政經結構變遷

在威權體制下，台灣政經依存關係的基本特色是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的分配仍維持一定程度的單向隔離，高層政治菁英可以獨立支配寡佔性經濟利益，財經官員在制訂和執行政策時，隨時可能受到高層政治力量的干預；但是反過來卻未必如此，私部門的經濟勢力並無有效途徑可以滲透到政治聯盟的核心，對於中央層級的財經政策的左右能力有限。在這種特殊的政經結構籠罩下，雖然國民黨政府對於經濟活動所進行的各種管制和干預非常廣泛，而且由此可衍生出的潛在特殊經濟利益極多，但並無引起利益團體蜂擁而至，出現激烈的特權競逐。¹再加上，政府所提供的有利於私人企業發展環境的誘導，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才和經濟資源皆紛紛投入生產性的活動。

然而，隨著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社會結構變遷，整個威權體制與國民黨的統治聯盟的組成也面臨重組的命運。首先，在台灣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迅速膨脹，在 1960 年代初期即成為台灣社會中的主幹。工業化對政治結構的影響一直要到 1970 年代初期才開始陸續出現。當時的外交危機，如退出聯合國、與盟邦紛紛斷交，不但直接撼動了國民黨的統治合法性，且更觸動了中產階級部分成員的政治覺醒。來自於中產階級，特別是上層中產階級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隨著台灣的國際生存環境惡化而逐漸升高。²

這種力量孕育出台灣在 90 年代逐步邁入自由化之際，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能量的儲藏庫。當戒嚴體制所提供的保護牆一旦卸除，社會上的新興政治反對力量和代表中下階層的社會力量一旦抬頭，執政黨就很難再繼續掩護這些經濟特權，否則勢必付出相當的政治代價。再者，過去政經結構雖有效地將經濟勢力滲

¹ 朱雲漢，「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52。

² 朱雲漢，*同前書*，頁 153。

透國家統治機構的現象主要侷限於地方基層，但卻也因此讓地方政府的公權力，無可避免地遭到侵蝕的命運。在邁向自由化前的台灣政經環境，是一種社會自主性逐漸抬頭、讓政府疲於應付；同時又出現，地方政治勢力對經濟特權競逐的胃口越來越大，甚至向政治高層蔓延。

二、邁向自由化的危機：市場扭曲與國家能力弱化

自經濟結構而論，台灣產業的分工型態大致為，中小型企業負責出口外銷、大型企業（官營和少部分私營）提供原物料和中間財。這種分工體系主要是建立於台灣的豐沛且低廉勞動力的基礎上。80 年代中期後，隨著台幣升值和勞力成本的攀升，台灣的產品逐漸失去價格競爭力，進而逼使中小企業外移，以尋求生存空間。然而，此外移效應亦造成大型企業在中間財供給的減少，推動了上游企業外移的骨牌現象，形成 93 年之後，另一波資本外移的風潮。這股風潮的特點正是以資本額大、技術能力高且以大陸市場為主的大型企業集團。³

反觀國家機器對於這批新外移風潮的態度是抵抗且保守的。面對 90 年代後的資本外移危機，政府進行了一項相當重要的經濟轉型：以「市場逐步開放」的手段來緩和資本出走的壓力；同時減少經濟管制、向國內外開放特許市場、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並給予產業優惠措施或改變產業政策（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穩固產業在台灣的投資根基。

因此，在 80 年代末期後，政府開始對金融服務、房地產、傳播媒體、電信、航運、電廠...等產業管制進行解禁；亦積極加速國營企業民營化的步伐。這些政策方向提供了私人企業集團對於租金競逐（rent seeking）和營運規模擴張的機會，同時也改變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結構。在自由化的過程中，國家常用行政保護手段來改善來維護國內的利益。這些手段的目的不外乎增加政府的收入、增進國

³ 王振寰，「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市），1997 年，第 27 期，頁 7-17。

內經濟福利，和強化特定產業的利益。⁴在威權時代下，中央政府透過財政、貨幣、產業或匯率等經濟政策來獲取政經利益及引導資源流向，並藉由「侍從／恩庇」關係賦予特定私人集團特許權利，使其獲得壟斷性資源。⁵當經濟自由化後，這些因保護政策所帶來的經濟租（rent）就以開放的姿態，接受各種利益團體的競逐。然而，表面上雖是標榜自由競爭的競標過程，實際上固有的政商利害關係卻仍然左右了國家資源的分配。

因此，私人商業集團向政治部門的施壓，推動著台灣市場開放的進程。這些企業集團在過去累積了大量的資本、技術、人力和資源，並透過政商網絡關係（如成為國會議員或與政治聯盟），而獲得這些特許執照。⁶就因企業挾重龐大的資源，再加上政治對於商業利益的需求，使得 90 年代後的政商關係從原本的上下關係，轉變成伙伴聯盟。⁷國家已不同以往，具有完整的政策自主性；相反地，一個由政府、金融業、財團聯盟（或派系）所建構出利益鐵三角關係左右了台灣市場自由化政策的走向。這種關係是一種私部門向公部門滲透，進而控制國家資源流向，確保私部門利益的網絡。因而，國家在從事經濟特許釋放的過程中，唯有挾重龐大財力的財團才有本事獲取經濟利益，金融部門則成為保證私部門利益來源的工具，結果導致國家政策在執行面上的弱化和被扭曲；社會的公平正義也隨之犧牲。

三、市場開放後的國內衝擊：不同產業競爭下的政治態度

當一國的市場越加開放，對國內不同部門的衝擊程度也不相同。在已開發國

⁴ 何思因，**美國貿易政治**（台北市：時英出版社，1994 年），頁 67。

⁵ 此為重商主義標準的運作模式。詳情請參見 Robert B Ekelund, Robert D. Tollison (1997), *Politicized Economies: Monarchy, Monopoly, and Mercantilism*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pp.12~26; 朱雲漢，**同前書**，頁 146。

⁶ 瞿宛文，「自由化與企業集團的趨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2002 年 9 月，第 47 期，頁 33 - 79；Cheng Tun-jen, Chang, Pei-chen (2003), *ibid*, pp.122~129.

⁷ 王振寰，「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第 14 期，頁 151-152。

家中，市場開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資本家和技術勞動者；對於開發中國家或是低度開發國家，受者者則是非技術勞動者。相反地，已開發國家的受害者則是非技術勞動者和本土資本家。這種損益關係是由國家的資源稟賦的差距所引起的：資源報酬豐富的要素會要求更多的自由化；相反地，稟賦稀缺的要素則希望政府提供多一點的保護，⁸進而引起對政治部門不同的壓力。

因此，1987 年台灣正式開放兩岸交流後，我方面臨到種種的經貿問題：在經濟日益自由化之際，外資不斷地進入台灣市場，使得本土企業的資本報酬遞減；勞動力和土地成本逐漸攀高，造成營運支出遞增。同時，中國又是一個勞動力豐富、土地成本低廉、資本報酬遞增的環境。因而，資本家在利潤極大化的驅使下，紛紛移往大陸發展。留下來的以低技術勞力密集產業為生存依歸的勞動者，進而形成一股結構性失業潮。質言之，在產業結構上，傳統的勞力密集出口產業很快喪失了比較優勢，台灣不再以出口非耐久消費財為主，而是機器設備和中間財的出口。⁹這一點很明顯地反映在上述兩岸的貿易結構上。

就勞動力方面，兩岸經貿交流對於台灣所造成的衝擊是造成國內的勞動力需求彈性變大，造成勞動力（特別是低技術勞動者）對於國際市場交流的「敏感度」提高、失業風險加大。其失業的傾向為農業與工業的男性：農業的就業人口從 96 年至 02 年，總共減少了 22.88%；工業部門中的男性失業密度為 1.33 亦遠比女性的 1.04 高。¹⁰而該些失業人口由於具備低度流動性和高度替代性等特色，因此，較傾向尋求政府的保護。¹¹

⁸ Jeffrey Frieden, Ronald Rogowski (1996),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Keohane, R, Milner, H 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Cambridge, [Engl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40~41.

⁹ 90 年代後，我國的出口的商品結構從原本的勞力密集度高、資本和技術密集度低的產品向勞力密集度低、資本和技術密集度高的產品發展。薛琦，「該鬆綁的勞動市場」，李誠主編，*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50-57；張隆宏，「全球趨勢下，我國製造業結構之調整與升級努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北），第 25 卷第 6 期，2002 年 6 月，頁 33-43；王振寰，「跨國界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同前書*，頁 7-17。

¹⁰ 吳忠吉，「產業與人力結構雙雙失衡」，李誠主編，*誰偷走了我們的工作*（台北市：天下文化出版社，2003 年），頁 84-85。

¹¹ 理論而言，資產的特殊性越高，其越有動機尋求政府的關愛眼神。Jeffrey Frieden (1991),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對資本家而言，台灣國內在政經市場開放後所面對的社會波動，造成一股對其營運風險的增加；再加上中國的經濟誘惑、國內經貿管制的解除、專業分工考量、語言和經商文化相通等諸多因素，形成一股台資前往中國發展的誘因。這種因資本快速流動而形成的跨國投資，其造成的國內衝擊，就成為兩岸經貿往來後的最大挑戰。有學者就把到中國投資所造成台灣內部的衝擊相互掛勾，使台灣失業率居高不下、所得分配惡化、政府財政支出被迫增加的現象歸咎於台資在大陸的過度投資。¹²

四、兩岸經貿交流後台灣的政治糾葛：抵抗與進取的拉扯

由於市場開放而傷害的弱勢經濟部門，如進口競爭產業、農業、低技術勞力工作者等，為了生存進而向政治部門要求予以保護，並形成對政治部門的壓力。以台灣為例，農業人口約佔全體就業人口的 13%，但農業產值只佔 GDP 的 3%，如此偏低的生產力以經濟效率來看，早應當被淘汰，把資源轉移到其他更有效率的部門使用。¹³然而，就政治人物而言，為了選舉的考量，即便產生資源配置無效率，仍然必須給予農業補貼和保護，甚至競相調高福利津貼的額度。¹⁴

因市場保護者對於兩岸經貿交流採取抵制的態度，其政治態度也就明顯地偏向於重商主義和強調中國與台灣的差異性。換言之，以台灣本土精神為號召的政治人物，透過把經濟受害的因素歸咎於中國大陸的崛起，來吸納此一政黨派別的政治實力。例如，民進黨和台灣團結聯盟等泛綠陣營，在政治光譜上就偏向「台灣／中國」對立的一方。因而，在經貿互動上，主張限制交流的質量，並引導分散海外投資；在政治上，則發起「新國族」運動，重視本土意識的優先性、強調中國對台的威脅性、建立起「新台灣人」的國族認同：¹⁵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p. 443.”

¹² 林向愷，同前文，頁 89-100。

¹³ 劉碧珍、陳添枝、翁永和，*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台北市：雙葉書廊，2002 年），頁 356。

¹⁴ 例如，由原本的三千元調高至四千元，甚至更高。*聯合晚報*（台北市），2003 年 12 月 4 日，話題新聞版；*聯合報*（台北市），2004 年 1 月 5 日，中部新聞版。

¹⁵ *聯合報*（台北市），2003 年 3 月 16 日，話題版。

台灣人過去因為族群對立，才會被外來政權利用，侵犯台灣；他呼籲台灣人族群和平相處，團結對抗外來威脅的力量，並且勇敢說出自己是台灣人。

此外，不同地區對於兩岸經貿交流的態度也不盡相同。佛來登 (J. Frieden) 和羅高斯基 (R. Rogowski) 認為，當國家的選區劃分越龐雜，對於該國的自由化意向就越難捉摸，甚至影響自由化的進程，¹⁶且不同的地區的稟賦特質對經貿開放的反應也有所差異，進而影響國會對於不同經貿政策的選擇。¹⁷就台灣的立委選舉而言，總共被劃分為 31 個選區 (含兩區平地和山地原住民)，選出 165 名分區、60 名不分區立委。因此，以數目而論，台灣的地區利益交雜情形甚高。

然而，若概括分為北東南東等四區，耿曙與陳陸輝認為，以商業和高科技比重較高的北台灣民眾，因受到兩岸交流獲利的驅使，對於與中國進一步接觸有較強的意願。因而，在政治意向上傾向於泛藍的政治光譜；然而，以農業為根基、勞力密集產業、重化工業為主力的南部縣市，因受到中下游產業外移的傷害，而傾向於限制交流的態度，進而成為「泛綠」勢力的大本營；中部縣市因兼有「獲益」和「損失」，因而在市場開放和政治傾向上則採取分裂的態度。¹⁸易言之，台灣各地區的稟賦結構反映了不同區塊對兩岸交流的意向以及因此衍生出的政黨偏好度。

五、市場開放後的挑戰：階級差距的擴大

經貿交流所帶來的後遺症造成國內社會的衝擊，首當其衝的就是「非技術性勞動者」(unskilled labors)。其傷害的方式可透過貿易進口便宜的勞力密集財、廠商為了減少成本而縮減對於非技術勞工的需求，或是壓低勞動密集商品的價格

¹⁶ Jeffrey Frieden, Ronald Rogowski (1996),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on National Policies: An Analytical Overview", in Keohane, R, Milner, H e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p. 43~44.

¹⁷ W Kaempfer., S. Marks (1993), "The Expected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U.S. Congress Action on Fast-Track Authority", *World Economy*, Vol. 16, pp.725~740.

¹⁸ 耿曙、陳陸輝，「兩岸經貿互動與台灣政治版圖：南北區塊差異的推手？」，*問題與研究* (台北市)，第 42 卷第 6 期，2003 年 11、12 月，頁 1-27。

等手段來進行。¹⁹這些因經貿交流而產生的經濟結構轉折，讓非技術勞動者面臨失業的壓力。因此，勞動者對於市場保護的要求和政府對經濟環境轉變的因應則成為政策調整的誘因。若政府不適時承擔起社會保險機制，只好由社會成員個別承擔市場開放後的風險，將造成社會龐大的成本。所以，政府大多會提供社會保險以緩和開放後代給社會的衝擊與代價。

政府因應社經結構轉變的方式有許多種，諸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教育政策...等方式來回應。然而，最直接的手段莫過於社會福利政策，透過所得再分配和移轉性支出等機制，把資源做平等的調配，以維護社會安定與保障。結果，政府的支出經常隨著市場開放的擴大而加劇，成為各國財政日益負擔沈重的來源。²⁰

台灣自 1990 之後，台灣經濟成長率從 91 年的 7.55% 下降至 2001 年的 -2.18%，隨後回升至 2003 年的 3.15%；國家社會福利支出佔 GDP 的比率從 91 年的 4.5% 攀升到 2003 年 5.6%；而賦稅收入佔 GDP 的比率從 91 年的 20% 劇降至 2003 年的 12.3%；其中，政府稅收的來源越來越依賴個人綜合所得稅，從 92 年的 12% 升至 2001 年的 19.5%。²¹因此，我們可看出，經濟成長與社會福利支出呈現反向互動、與稅收比例呈現同向波動的現象。

原因在於，國家日漸受到外部經濟衝擊的影響，為了吸引投資、刺激經濟發展，政府不斷地以租稅減免的方式來獎勵投資，其中以 1991 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範圍最大，稅基侵蝕也最深。而 99 年中央做出調降金融營業稅率、土增稅減半徵收等政策，都讓政府的稅基狀況更加嚴重；²²反倒是受薪的中產階級成為繳稅大戶。結果使有錢人的財富日益膨脹，中產和弱勢階層卻越加貧困。²³

¹⁹ Adrain Wood (1995), "How Trade Hurts Unskilled Work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3, p. 64.

²⁰ Geoffrey Garrett (1998), *Partisan poli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6 - 50

²¹ 財政部賦稅統計年報 (2003) :

<http://www.mof.gov.tw/webPage.asp?ctNode=133&CtUnit=46&BaseDSD=7&CuItem=9565> ;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 <http://www.dgbas.gov.tw/dgbas03/div4all.htm>.

²² 天下雜誌 (台北市), 2003 年 8 月 15 日, 第 281 期, 頁 55。

²³ 天下雜誌 (台北市), 2003 年 8 月 15 日, 第 281 期, 頁 44 - 50。

這現象引發了社會公平性的爭議。

這種對社會不公平性的憤恨由來，一是兩岸經貿後所帶來的直接衝擊；二來亦是因要素稟賦間不同的流動性所致。西斯考 (M. Hiscox) 發現，當要素稟賦流動低時，較易形成進口競爭和出口競爭產業之間的競逐；一旦要素流動性提高後，就會產生階級 (class) 的觀念，並關注經貿開放後的社會公平性問題 (表 5.1)。²⁴

表 5.1、要素流動性程度的預期影響

要素流動的程度	聯盟型態	對階級政黨 (class-based parties) 和組織的影響力	對產業團體 (industrial group) 的影響力
低	產業聯盟	內部會因貿易議題 而分裂並對開放或 保護的議題採取較 為模糊的政策立場	進口競爭型產業積極地 為保護而遊說；出口競 爭型則為開放遊說
高	階級聯盟	各階級內部會因貿 易議題而更加團結 並對保護和開放的 態度逕渭分明	不積極遊說

資料來源：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9

資本的快速流通是全球化的一大特色。國家為了要吸引資本家或是避免資本

²⁴ Michael Hiscox, (2002),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Commerce, Coalition, and Mobil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8-39

外移，則透過匯率控管、利率優惠、租稅減免和產業政策來吸引住企業。²⁵因此，從 91 年至 03 年，台灣政府一來為了吸引外資、讓台商「根留台灣」；二來避免投資過度依賴中國，進而把經濟優惠措施集中在資本（產業投資與交通建設）和資金密集（金融證券業）的經濟部門中。²⁶

至於，流動性低的勞動者（尤其是低技術密集勞工），則成為資本流動下的犧牲品。而這種收入重分配一旦惡化，貧富差距的鴻溝就逐漸惡化，²⁷階級對立的觀念就會開始萌芽，要求社會公義的聲浪也更加澎湃。²⁸2003 年 8 月，以公平正義聯盟為號召的「泛紫聯盟」出現，²⁹正是代表著經貿交流後，經濟要素稟賦流動性不一問題所衍生的產物。

資本家與弱勢勞動者的矛盾，造成了政府必須要付出更多的代價來緩和兩造的衝突：一方面提出更多的政策優惠吸引資本家；同時，以社會保險和失業津貼的方式維持社會穩定。其造成的結果是，財政支出的惡化和政策調整成本的增加。質言之，國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並沒有因台灣的市場開放而好轉，反倒是台灣本身的國家能力在開放的過程中，日益被市場的力量，和隨之而起的利益團體所侵蝕。就某種程度上，台灣的社會並沒有因開放而獲得巨大利益，而是在一個缺乏有利於競爭的制度環境下，產生更多的弊病。

六、台灣的契機：持續培養策略產業與維持多元自由社會

若純就經濟層面考量，台灣確實可透過國際經濟的交流和兩岸經貿的互動而

²⁵ 資本家對於國家的政策有著不同的敏感度，以金融為主的資本家則對政府短期政策較為敏感；而實體投資的資本家對於政府長期的政策較為關注。彼得·高恩（Peter Gowan），**華盛頓的全球賭博**（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7-21；Jeffrey Frieden (1991),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p.437~441.

²⁶ **天下雜誌**（台北市），2003 年 8 月 15 日，第 281 期，頁 56-57。

²⁷ 2001 年，台灣前 10% 富有族群收入是最貧窮 10% 的 61.3 倍。**天下雜誌**（台北市），2003 年 8 月 15 日，第 281 期，頁 45。

²⁸ **天下雜誌**（台北市），2003 年 8 月 15 日，第 281 期，頁 71-72。

²⁹ 該聯盟發起成員為台灣和平促進基金會，連署團體有殘障聯盟、婦女新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勞工陣線等社運團體，主軸訴求在於社會安全制度和公平性。**中國時報**（台北市），2003 年 8 月 11 日，政治新聞版。

獲得龐大利益。然而，對國家安全和競爭力而論，台灣在特定的核心技術能力上，例如高度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以及境外移出後造成競爭力減損的產業，都必須力圖加以管制和保護，以維護國家本身的核心能力與安全性；³⁰甚至通過向競爭對手國架起的「技術安全網」(Technology Safety Net)，擴大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差異性、提高台灣產品的附加價值，³¹以確保台灣與國際經貿接軌，尤其與中國大陸競爭時，在人力和技術層次上的核心能力。

因此，保有一個核心的競爭產業部門，就成為國家在促進經濟自主性、國內經濟發展的主要的重點。³²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推動的「策略性產業」，就是基於競爭力和安全性考量而制訂出不一樣的重點產業。這種濃厚的「策略性貿易」理論思維所強調的重點在於，一個國家要維持強盛，就必須在某些經濟部門或產業維持領先地位，企業或是政府都有能力和責任來培育競爭性產業，以維持國家競爭力。³³例如，台灣在這幾年來所積極從事發展的「兩兆雙星」計畫，³⁴就是考量台灣經濟的要素優勢地位在回應中國的競爭，以及全球化佈局後所衍生的政策結果。

其隱含的思維在於，一方面符合台灣的要素稟賦逐漸轉向技術、資金、管理技能和人力素質等高附加價值要素的趨勢上；同時，也因應與兩岸經貿交流所引導出的專業分工體系後的生產區隔模式。主要目的是在確保兩岸競合時，台灣在

³⁰ 吳重禮、嚴淑芬，「我國大陸經貿政策的分析：論兩岸經貿互動對於台灣地區經濟發展之影響」，*中國行政評論*（台北市），第 10 卷第 2 期，2001 年 3 月，頁 160；Eric Marshall, Green, (1996), *Economic security and high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the case of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estport, Conn. ; London: Praeger).

³¹ 蔡毓芳，「建立兩岸技術差距安全網」，*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北市），第 26 卷第 10 期，2003 年 10 月，頁 29-35。

³² Miles Kahler (1996), "Trade and Domestic Differences", in Berger, S., and Dore, R. eds.,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98~332.

³³ Paul Krugman ed.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Robert, Gilpin (2000),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96~99.

³⁴ 為維持台灣既有的製造優勢與實力，政府積極推動「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並由經濟部擬定「兩兆雙星產業發展計畫」，明確勾勒出未來核心與新興產業政策方向，其中「兩兆」產業是指半導體及影像顯示產業，該兩項產業未來產值分別超過台幣 1 兆元以上。「雙星」產業則指數位內容及生物科技產業，這兩項產業屬未來明星產業因此稱為雙星產業。*經濟日報*（台北市），2002 年 4 月 16 日，綜合新聞版；*聯合報*（台北市），2002 年 05 月 8 日，要聞版。

技術和產業發展上的優勢性以及本身的經濟利基。。

除競爭力的考量外，在政治體制和社會性質方面，台灣本身的民主體制與社會開放度亦是重要的生存基礎。在短期內，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雖然不似威權體制般，能夠快速地由中央集權政府調配資源，然而長期而言，一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對於資源的運用和創造遠比威權政體還來得有效率。³⁵台灣社會正是擁有此多元、開放、民主、充滿創意的優勢，³⁶幫助企業和經濟部門在從事研發和資源的配置上，會做出較中國市場更有效益的選擇。該些無形的社會資本亦是形塑台灣在兩岸競爭時的後盾，以及台灣面向全球的核心基礎。。

七、制度變革：促進國家的市場競爭性

在殖民統治時代裡，財富的積累是靠著殖民地的資源掠奪來完成；威權時代下，台灣的財富積累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來實現；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中，財富的追求必須要靠私有的經濟部門去達成，資源配置效率化才成為可能。政府的角色應轉變為以自由經濟學派所主張的，制度的建立、社會秩序的維持、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國家安全的保障。政府在促進制度演進的過程中，其信念應以維護市場完善運作為政策制訂的核心價值。在此原則下，制度的轉變是幫助強化市場競爭力和減少市場運作的不確定性；政府的管制（regulation）與自由市場間並非全然是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³⁷

質言之，我方政府在面對全球化的開放潮流和中國的政經威脅之際，其回應的主軸應在於：對外，尋求透過與國際制度的接軌，以圖得台灣在國際市場的可

³⁵ Stephen Krasner (1977), "Domestic Constrain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everage", in Klaus Knorr and Frank Trager eds.,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Lawrence, Kan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pp.178~179.

³⁶ 由於身處移民社會和受過多次異國統治的經驗，培養出台灣對於異文化吸收具有相當豐富的包容力，進而形成多元活力的社會本質，此特質為企業鋪下了一張從事創新研發的絕佳溫床。天下雜誌（台北市），2004年2月1日，頁158；張亞中，「全球化的台灣發展：建立台灣為『開放的服務型國家』」，遠景季刊（台北市），第3卷第3期，2002年7月，頁30-33。

³⁷ Steven Vogel 就提出，市場運作越自由、完善的國家，其政府的規範也越龐大和詳盡。Steven Vogel (1996), *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信度 (credits) 和能見度 (visibility); 對內, 建構出一套堅固且長久的社會安全網和福利政策以緩衝市場開放後的階級差距擴大的挑戰。叢爾小國的台灣在先天上就是無法與強國相抗衡。然而, 台灣並非因此就只能任國際市場宰割, 或走向保守閉關的老路。

台灣在當前所應面對的挑戰, 不在於「開放 / 封閉」的二元選項, 而是去正視市場自由化所帶來的衝擊, 並提出一套穩固的回應機制。開放, 確實會帶來許多社會衝擊和脆弱性, 但這也帶來了台灣必須要走向完善的社會福利國家的契機。唯有穩定的社會基礎, 才有繁榮的經濟力量; 唯有促進市場機制完善運作的制度, 才能把國家競爭力發揮至最極致; 唯有多元包容的社會文化, 才可能刺激出創意的火花和高品質的技術能力; 唯有從世界看台灣, 才將使台灣未來的發展更為寬廣和無限。

八、本研究的缺失與未來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在於, 一方面討論台灣在自由化後如何運用其比較優勢來獲取自身的利益、充實國力; 另一方面, 亦思考在自由化的背後, 台灣所可能面對的困境。本研究主要是以羅高斯基和西斯考的經濟要素在貿易交流後的結構模型, 並輔以佛來登的匯率與國家政策自主性互動模式為架構。然而, 該些架構並無法全然地套用在台灣的案例上, 只能部份適之。因而, 本研究未來可繼續衍生的面向可進一步地從貿易交流所產生的政治問題來作發揮, 諸如市場開放後, 台灣各地區的政治態度差異; 台灣的產業如何形成不同的政治聯盟來對公共決策施壓; 不同的經濟部門對於兩岸經貿能產生怎樣程度的影響力; 我方政府如何透過哪些優勢經濟部門來進取中國的不同產業部門, 儘可能地使台灣獲得利益, 這些角度都是未來吾人可努力發展的研究領域。